

周远廉 ◎ 主编

清朝兴亡史

第三卷

康熙盛世

周远廉 ◎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周远廉◎主编

清朝兴亡史

第三卷

康熙盛世

周远廉◎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朝兴亡史/周远廉主编.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402-4103-2

I. ①清… II. ①周…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清代 IV. ①
K249.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6637号

清朝兴亡史

周远廉 主编

第三卷《康熙盛世》

周远廉 著

责任编辑: 满 鳌

封面设计: 一言文化传媒

责任校对: 赵 媛 扈二军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

电 话: 010-65240430

邮 编: 100054

印 刷: 四川大自然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字 数: 568千字(第三卷)

印 张: 18.5(第三卷)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0元(全套)



周远廉教授近照

周远廉，1930年生，四川省资中县人，195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清史专家。出版学术专著：

《清太祖传》（独著），人民出版社，2004。

《清摄政王多尔衮全传》（与赵世瑜合著，1993年获吉林省长白山优秀图书二等奖），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再版）。

《顺治帝》（独著，1993年获吉林省长白山优秀图书二等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初版），2004（再版）；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再版）。

《康熙新传》（独著），故宫出版社，2013。

《乾隆皇帝大传》（独著，获“中南五省市优秀图书奖”和“全国畅销图书优秀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台湾大行出版社，1993；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再版）。

《清高宗弘历》（独著），台湾万卷楼图书公司，2000。

《乾隆画像》（独著），中华书局，2005。

《清朝开国史研究》（独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故宫出版社收入《明清史学术文库》，2013（再版）。本书获辽宁出版局1981年优秀图书一等奖。

《清朝兴起史》（独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再版）。

《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与杨学琛合著，1986年获“第一届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一等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故宫出版社（收入《明清史学术文库》），2013（再版）。

《清代租佃制研究》（与谢肇华合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中国通史》（白寿彝总主编）之17卷、18卷《清》分卷（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清朝通史》之《乾隆朝》分卷（独著），紫禁城出版社，2003。

《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总主编，1998年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

《金川风云》（独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

《岳钟琪传》（独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

另出版长篇历史小说《香妃入宫》（独著，华艺出版社，1993）、《乾隆皇帝下江南》（独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天下第一清官：清代廉臣张伯行》（独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宁远大将军岳钟琪》（独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编 辅政与亲政

001 一、机遇与挑战并存

006 二、辅政功过

019 三、计擒鳌拜

028 四、亲政五年 国库存银两千万

028 (一) 两道策文

030 (二) 免赋简表

038 (三) 垦荒 “十年起科”

041 (四) 禁加派 革耗银

044 (五) 一二·六上谕

048 (六) 年收赋银四千万两

第二编 百战封疆 固若金汤

050 一、平定三藩之乱

050 (一) 当时不该撤藩

- 062 (二) 立即撤藩 依据薄弱
- 070 (三) “撤亦反，不撤亦反”
- 074 (四) 平藩之战 初期失利
- 088 (五) 八招奏效 消灭三藩

105 二、统一台湾

- 105 (一) 驱逐荷兰 郑成功收复台湾
- 108 (二) 郑、清议和
- 110 (三) 一波三折 施琅挂帅
- 122 (四) 澎湖大捷 功在千秋
- 129 (五) 招抚成功 郑氏归清

135 三、两征雅克萨 签订尼布楚条约

- ### 147 四、三征噶尔丹 西北安定
- 147 (一) 阿喇尼兵败乌尔会河
 - 159 (二) 乌兰布通大战
 - 163 (三) 多伦诺尔会盟
 - 177 (四) 大军进剿 准备充分
 - 190 (五) 御驾亲征 噶尔丹惨败昭莫多

213 五、驱逐准军 “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图”

- 213 (一) 哈喇乌苏 色楞全军覆没
- 224 (二) 康熙决策 大军进藏驱逐准军
- 232 (三) 六百川兵 收服察木多
- 243 (四) 四千绿营兵 平定拉里
- 249 (五) 违令进军 兵不血刃入拉萨
- 255 (六) 册封六世达赖 三藏阿里悉入版图

第三编 文治成效显著 田多银多国富

261 一、田地、赋银简表

273 二、扶植清官 欲图“澄清吏道”

273 (一) 廉官辈出

278 (二) “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

285 (三) “天下清官第一”张伯行

287 三、治理黄河

287 (一) 治河八疏

299 (二) 斫辅罢官

323 (三) 亲理河工

333 四、博学鸿儒科

333 (一) 鸿博开科

338 (二) 求儒若渴 多方敦请

342 (三) 鸿儒归心 遗贤易念

344 (四) 纂修《明史》

354 五、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南书房

354 (一) 议政王大臣会议

366 (二) 南书房

379 六、朱批奏折

第四编 十大弊政

404 一、裁存留 富朝廷

404 (一) 摄政王未减存留

406 (二) 顺治帝裁减存留百分之三十

409 (三) 辅政大臣裁减存留

410 (四) 康熙减存留

413 (五) 大裁存留 祸害无穷

416 (六) 议论存留 巧言诡辩

418 (七) 将外省钱粮尽收入户部

420 二、捐俸工 地方遭殃

420 (一) 地方公共用费

424 (二) 军需报效

426 (三) 办理“皇差”

429 (四) 孝敬京官

431 (五) 直隶之例

434 (六) 捐俸三害

437 三、捐纳泛滥 敛银万万

437 (一) 《清史稿》论捐纳

438 (二) 监贡之捐

439 (三) 军需之捐

442 (四) 捐例之争

447 (五) 西安赈灾之捐

450 (六) 山东储粮之捐

451 (七) 广西积谷之捐

454 (八) 广东备赈之捐

- 455 (九) 京师开捐
458 (十) 利国库 益贪官
461 (十一) 圣德大损 圣欲难消

466 四、盐课翻番

- 466 (一) 引课简表
470 (二) 课银激增
472 (三) 盐政“余银”十万两
473 (四) 匪费超过正课
476 (五) 地方官员的陋规
478 (六) 纲商富甲天下
482 (七) 盐贵、私盛、引滞、课欠

485 五、关税倍增

- 485 (一) 税关的设立
486 (二) 额税增加
488 (三) 余银、盈余、铜斤银后患无穷

492 六、广设皇庄 占地数百万亩

- 492 (一) 增置粮庄数百
498 (二) 三大祸害

502 七、内帑如山

- 502 (一) 祖遗内帑
504 (二) 外库、内库银，皆系“朕之帑金”
505 (三) 工程节省银
507 (四) 草豆节省银
508 (五) 铜铅节省银

- 512 (六) 税关盈余银
519 (七) 年进百万，主要来自国库
521 (八) 内帑八害

- 525 八、督抚规礼 “朕管不得”
525 (一) 总督规礼二十万两
528 (二) 巡抚规礼
532 (三) 司道规礼
536 (四) 规礼的来源与支出
539 (五) 规礼的性质与危害
540 (六) “外边汉官有一定规礼，朕管不得”

- 545 九、火耗年征数百万 “钦定加一”
545 (一) 严禁加耗
547 (二) 火耗难革之因
549 (三) “有耗银之实，无加派之名”
556 (四) 耗重民苦
559 (五) “从来之积弊”——雍正帝评皇考之耗银政策

561 十、“名粮”与“公费名粮”

- 573 结语：“康熙盛世” 杰出帝君
574 (一) 六项标志
580 (二) 十大弊政的出现
582 (三) 盛世的基本特点：邦强国富、君富官富、小民
勉可“安生”

第一编 辅政与亲政

一、机遇与挑战并存

康熙年间（1662—1722年），外部环境并不太平。俄国正在向外急剧扩展，夺占黑龙江大片土地，筑造尼布楚、雅克萨等城，准备继续向东扩张，如果不将其挡住，将会严重影响清国东北安全；但是设若迎头痛击，打垮其远征殖民军，阻其进犯，则因其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上百年里，主要忙于欧洲的扩展，先后与瑞典、土耳其进行了几次大的征战，又三次参与瓜分波兰，腾不出更多的兵力、财力和时间，因此沙俄虽然一直对中国的东北、西北边疆虎视眈眈，时时想伺机出兵，侵占中国领土，但力不从心，因而在康雍乾三朝，没有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也为清朝提供了有利时机。清王朝周边的少数民族，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正在蓬勃兴起，噶尔丹汗、策妄阿拉布坦汗侄二人先后率军南下，侵占漠北喀尔喀蒙古，进犯西藏，严重威胁了中国西北、西南安全。

国内的状况，也不太好，甚至还存在较为严重的危机。一是民心尚未“悦服”。天命、天聪崇德、顺治三朝的弊政，使得国内以汉民为主的各族人民，对清政府严重不满，并未真正悦服归顺。康熙帝玄烨的曾祖父清太祖努尔哈赤，攻占辽东以后，对汉人施行严厉、野蛮的民族压迫，制定了“抗拒者杀、俘者为奴，降者编户”的方针，多次宣称我等“豢养尼堪”，勒令汉人按照女真的发式剃发归顺，圈占汉人田地，大肆烧杀掳掠，掠民为奴。天命三年四月，取东州等城堡500余，掠人畜30万。第二年打下清河、开原、铁岭，“杀掳官兵军民数十万”。进据

辽沈地区以后，努尔哈赤多次遣军剿杀反金人员。因复州民欲逃往明国，派兵2万征剿，复州城原有1.8万余男丁，除残留500丁外，其余尽数屠杀。

因辽民激烈反对金国汗、贝勒的残酷压迫，天命十年十月初三，金国汗努尔哈赤下谕，指责汉民不忠，叛逃不绝，命令八旗官将分赴各地清查，大杀反金人员，将筑城纳粮的“小人”，编隶汗、贝勒的拖克索（庄），成为农奴制庄园中的农奴。

因为金国汗、贝勒的血腥屠杀，虐待汉人，赋重役烦，又连年征战，导致汉人拼死反抗，大量逃走，致使田园荒芜，百业凋敝，粮食奇缺。《清太宗实录》卷3，第26页概述此时情形说：“时国中大饥，头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国中银两虽多，无处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良马一，银三百两；牛一，银百两；蟒缎一，银百五十两；布匹一，银九两。盗贼繁兴，偷窃牛马，或行劫杀。”

玄烨的祖父清太宗皇太极继位为汗后，虽然释放了大批庄丁，编入民户，也讲了一些抚育汉人的言辞，但仍然施行严重欺凌汉人的民族压迫政策。连归顺的降金汉官，尽管可以管辖汉兵管束汉人，为官作臣，但日子也不好过，且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俱归并满洲大臣”，所有马匹，“不得乘，而满洲官乘之”。“所有牲畜”不得用，“满洲官强与价两买之”。“凡官员病逝，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虽有腴田，不得耕种，终岁勤劬，米谷仍不足食，甚至鬻仆典衣以自给”。

皇太极又穷兵黩武，八征明国，两征朝鲜，三征察哈尔蒙古，掠获巨量金银、人口、牲畜、绸帛，所掠明国人口数百万，迫使男女老少为奴作婢。仅仅几十年的破坏，就使得原来“田人富谷，泽人富鲜，山人富财，海人富货”，“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货贿充斥，每岁终，辇致京师，物价为之减半”，军民数百万，百业兴旺，富庶繁华的辽东地区，变成了“一望荒凉”，“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之地。

辽东、山西、山东、河北上千万人家破人亡的血淋淋旧仇尚未淡化，又添上了清帝入主中原的五大弊政新恨。

顺治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奉命大将军睿亲王多尔衮统领八旗劲旅，大败大顺农民军李自成部于山海关后，幼帝福临入主中原。多尔衮一方面听从大学士范文程等汉官建议，基本上沿袭明制，承认中原旧有

的土地制和租佃制，继续明国的赋役制，确定轻徭薄赋原则，“地亩钱粮，照前明会记录原额”，革除明末如“三饷”等一切加派，关税也照万历年间原额征收，又一再宣布“民复其业，官仍其职”，满汉一家，任用归顺清朝的汉官。多尔袞并于顺治元年五月二十三日谕兵部，取消五月初三日谕令各地官民“剃发归顺”的谕旨，宣布“自今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①这一切，争取到大多数汉人的支持，所以顺治元年十月初九，摄政王多尔袞派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攻大顺军，十五日派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进攻南明福王，清军进展异常顺利，仅仅用了九个多月，就占据了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湖广等省或该省的大部分州县，“一年之间，中原归顺比风还快”。然而，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多尔袞，却冒天下之大不韪，于顺治二年六月十五日，下达了在全国厉行剃发的谕旨，所有官、民、兵，“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上疏谏阻之官，“杀无赦”。“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激起汉人莫大愤怒，顿时，反清抗清烽火燃遍全国。多尔袞恼羞成怒，先后派十几位大将军统军征剿，大肆杀掠，血腥镇压，一直到他死去，全国尚未完全统一，千千万万汉人家破人亡，旧恨未清，又添新仇，满汉矛盾十分尖锐。

顺治帝福临亲政以后，强调永不加赋，多次减租免税，制定《赋役全书》，严惩贪官污吏，欲图实行儒家仁政治国学说，力求“轻徭薄赋”，“吏治清明”，又倾心汉文化，重用汉官，开科取士，争取士子。在他的努力下，满汉矛盾有所缓和，但是还不能说已经得到了民心，汉人只是勉强归顺，只是不再猛烈地公开反抗而已。

人们常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明王朝就是因为君臣们坏事做尽，民不聊生，天怒人怨而灭亡的。清帝虽然打下了江山，可是征战杀掠，五大弊政，“德泽素未孚洽，吏治不能剔厘”，未能赢得人心。旧仇新恨，使很多汉人满腔怒火，随时想伺机反清。所以来康熙十二年（1673年）平西王吴三桂起兵之时，“伪檄一传，四方响应”。“各省兵民，相率背叛”，半年左右，“已失八省”。^②

二是满洲隐忧。清帝之所以能入主中原，并不是民心所向，传檄而

^① 《清世祖实录》卷5，第10页。

^② 《清圣祖实录》卷99，第8、10页；卷253，第9页。

定，而主要是靠以满洲八旗为核心的满蒙汉八旗将士的骁勇善战，拼死厮杀，武力征服，才打下了江山。满洲八旗将士的强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直接影响清王朝的兴衰存亡。然而，到了康熙年间，满洲八旗出现了严重危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丁太少。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时，八旗共200个牛录，每牛录300丁，共6万丁。此后，并叶赫，征剿吉林、黑龙江瓦尔喀、虎尔哈、渥集、索伦等“野人女真”部，到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时，收编了两三万丁。皇太极继续经营黑龙江地区，又收编了“野人女真”一二万丁。这就是说，从1615年定八旗制度时的6万男丁，到1643年入关前夕，单只算增加的收编女真三四万丁，就应该有10万男丁。而从1615年到1643年，过去了29年，在这29年里，只算1615年的6万男丁，正常情况下，也应滋生1万丁吧。因为，这6万丁，其家必然相应有未成丁的儿子、兄弟，他们在这29年里，会出生、长大、成丁。至于增加的收编三四万丁，也应滋生出几千丁来。所以，到1643年，八旗满洲男丁应该有10万到12万男丁。然而，崇德八年（1643年），满洲八旗只有310个佐领（一说309个佐领）和18个半分佐领，此时每佐领有男丁200丁，即八旗，即八旗满洲只有6.6万丁，仅仅相当于29年前定八旗制度时的6万男丁数字。

自崇德八年到顺治十四年（1657年），过了14年，男丁不仅没有繁殖增加，反而减为49695丁，减少了12305丁，减少了20%。至于减少的原因，不难知晓，那就是长年征战，战死、伤重而死。

满洲八旗男丁锐减，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男丁也是这样。崇德八年，蒙古八旗有117个佐领和5个半分佐领，每佐领男丁200，共有男丁23900丁。到了顺治十四年，蒙古八旗有男丁26053丁，增加了2153丁。崇德八年，汉军八旗有157个佐领和5个半分佐领，共有男丁31900丁，到顺治十四年，增加了45个佐领，共40900丁。^①

顺治十四年，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共有男丁116648丁，即使丁皆披甲，也只有11万余名兵士。面对全国1700余个府、厅、州、县，平均每个府、厅、州、县只有61名兵士，哪能管辖。

^① 一史馆：《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载《历史档案》1988年第4期。

满洲隐忧危机体现的另一方面是，人丁既少，又军威不再。想当年，“固初开创，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系诸王是庸”，睿亲王多尔袞、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饶余郡王阿巴泰、成亲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等，皆曾南征北战，军功卓著。一大批贫穷诸申、小部酋长及其子侄，身经百战，屡败敌军，一个个成了开国元勋，荣封公、侯、伯、子、男。像贫穷诸申额亦都，“骁勇善战，挽强弓十石，能以少胜众，所向克捷”，任一等大臣、右翼固山额真，追封弘毅公，其子图尔格封一等公。苏完部部长之子费英东，智勇双全，“战必胜，攻必克”，“善射，引强弓十余石”，“佐太祖成帝业，功最高”，被努尔哈赤赞为“万人敌”，追封直义公。这些开国功臣，在顺治年间封为公爵的有9人，侯爵3人，伯爵8人，子爵22人，男爵52人。

然而，到了康熙年间，八旗王公、大臣、将领，按辈分、年代来说，从努尔哈赤、舒尔哈齐弟兄算起，基本上是第三代、第四代了，他们没有经过建国时期血雨腥风、你死我活的战火熔铸，没有受过家道贫寒出征行围之时必须自己煮饭牧马艰苦生活的磨炼，而是养尊处优，锦衣玉食，骑射生疏，缺乏朝气，太难找出当年的“万人敌”，聪睿、英勇的“巴图鲁王”、“睿亲王”了。

要想以难觅名帅、大将、贤相、能臣的四五万、五六万、七八万满洲八旗人员，来统治上亿人口且不“悦服”的汉人，来征讨反清的几十万汉兵，不说这是难于上青天，也是很困难了。

所以，几百年来，中原的君臣当中，流行了一句名言，即“胡虏无百年之运”。两宋时期的辽国契丹、西夏的党项、金国的女真，虽然他们的立国先祖辽太祖阿保机、西夏世祖元昊、金太祖阿骨打及其子侄将领，皆曾身经百战、骁勇无敌，创立强国，然而几十年后，即勇猛不再，国势衰弱。就连铁骑踏遍欧亚的蒙古，出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其孙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建立了“舆图之广，历古所无”的大元帝国，也未能维持多时强盛，仅仅过了八十多年，就被明太祖朱元璋遣军将元顺帝逐出中原，赶回蒙古。康熙帝、清政府，能逃脱这个厄运吗？有可能，也没有可能，有有利的条件，也有不好的因素，在这机遇与危机并存之时，就看辅政大臣与玄烨如何把握，如何执政了。

二、辅政功过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清世祖福临去世，遗诏命立佟妃所生皇三子年方八岁的玄烨为皇太子，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保翊幼主，佐理政务”，开始了辅政大臣执政时期。

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誓告于皇天上帝及大行皇帝灵位前。誓词说：

“大行皇帝灵位前，然后受事，其词曰：兹者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为庸劣，遗诏寄托，保翊冲主，索尼等折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仇怨，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唯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复各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殛罚，夺算凶诛。”^①

索尼、遏必隆、鳌拜均是太宗死时坚决拥护皇子即位反对多尔衮称帝之臣，后遭多尔衮迫害，索尼被革职籍没；遏必隆革去世职，夺佐领；鳌拜革世职。苏克萨哈首告亲王多尔衮谋逆，为顺治帝亲政除敌立了大功。四人皆被世祖擢升宠信，索尼晋封至一等伯，擢内大臣；遏必隆封一等公，授领侍卫内大臣；鳌拜晋二等公，擢领侍卫内大臣；苏克萨哈晋二等子爵，授领侍卫内大臣。福临相信这四位大臣能够忠于朝廷，肩负起“保翊幼主”的重任。因此，他才宣布，特命索尼四臣“佐理政务”，创立了辅政大臣新制。

辅政大臣主政的前几年，基本上贯彻执行了先皇以儒家仁政治国精神，严惩贪官、减免租赋，欲图使“吏治清明”，“轻徭薄赋”。

辅政大臣努力整顿吏治，多次以幼帝名义下谕，讲述惩贪利民利国之事。

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初六，分别谕吏部、户部：

“谕吏部、都察院：民生之安危由于吏治之清浊，吏治之清浊，全在

^①《清圣祖实录》卷1，第5、6页。